

疫情下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之殤

■ 文長春

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在一定意義上講，2020年初的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說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公共危機之一，它無異於一次世界性的全方位會考，顯然，西方社會在這次會考中沒有交上完美的答卷。在這次疫情面前，西方國家和社會普遍地出現了一些與抗疫並不相符的景象：英國的集體免疫、美國的東西聯省自保、西班牙的民眾抗疫遊行、瑞典的四不放任政策，期間呈現出個人的無助、社會的無序、政府的無力狀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危機從中可見一斑。這些看似突發的「黑天鵝」事件卻絕非偶然，實質上是司空見慣的「灰犀牛」現象，我們相信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文化的影響，從而導致了西方政府的進退失據。

西方社會儘管意識形態多元，但自由主義(包括近數十年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是其主流範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歷史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從宏觀到微觀來看，自由主義深刻地形塑著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樣態。西方社會的所謂「奇葩」操作毫無誇張地說均拜自由主義所賜，因此透視西方的抗疫操作的真實面目，必須對其自由主義文化根源進行深刻地

剖析與辯證地批判。

在理論上，自由主義堅持以絕對的個人主義為其理論根基，以片面的消極自由為其理論旨歸，以機械的理性主義為其理論依托，以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為其理論最終訴求。在堅持四個至上的理論本位思想影響下，西方自由主義在政治實踐中構建了四個頑固的現實邏輯，即以固化的資本邏輯為其現實基礎，以放任的市場邏輯為其現實標準，以偏狹的選舉邏輯為其現實形式，以僵化的冷戰邏輯為其現實目的。

一、絕對的個人主義本位下壟斷的資本邏輯

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時，各國政府本應宣布進入全面嚴查患者的緊張狀態，然而我們卻驚異地

看到美國等奉行「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卻對此持放任態度，信奉「個人至上」的西方公民無從知曉自己的染病情況，盲目的政府對應著盲目的民眾，共同面對著疫情肆虐的現實。為什麼呢？昂貴的檢測費用、短缺的檢測試劑、無助的居家隔離、天價的治療花銷、無望的醫療制度，使得民眾只能自動放棄了治療，陷入自生自滅的境地。

摘要：面對新冠疫情，西方社會所提交的答卷並不完美，期間出現了大量的個人無助、社會無序與政府無力的不堪狀態。追根溯源，作為西方社會主流範式的自由主義文化難辭其咎。自由主義文化在其理論與實踐中的局限性展露無遺，其理論上遵循絕對的個人主義、片面的消極自由、機械的理性主義與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本位；在實踐中衍化為壟斷的資本邏輯、放任的市場邏輯、偏狹的選舉邏輯與固化的冷戰邏輯。理論與實踐的共同作用，導致自由主義無可避免地陷入困境。這次西方社會的戰「疫」表現進一步揭露自由主義的文化危機，其固有的傲慢與偏見昭示著自由主義文化之殤。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自由主義文化危機；個人主義；西方中心主義



當代西方國家與社會在此次疫情面前的表現，絕非偶然為之，其中個人主義的影響至為根本。自由主義奉個人主義為其理論圭臬，推崇和強調個人主義至上。在探尋物質實體與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學思維主導下，個人被視為構成社會的基本粒子與社會的本原，個體是最終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實體。「我思故我在」確證了個人主義以個人為中心的倫理學、形而上學。

個人主義至上堅持以個人利益為本位，一方面表現為「個人至上」，一方面表現為「利益至上」。「個人至上」意味著個人成為社會主宰，而極端的個性自由、自決原則撕裂著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聯繫紐帶，吞噬著共同信奉的社會原則。個人的原子性與單子性，使得社會極易被割裂成各自獨立的、封閉的「孤島」，社會變得「空心化」、「離散化」、「碎片化」。絕對的個人主義的結果必將導致唯我獨尊，個人凌駕於社會之上。「利益至上」意味著利益一旦被奉為崇高，就會成為社會行動的唯一規範，就會肆無忌憚地竊居本屬於道德的聖位。當個人至上與利益至上統合在一起之時，當個人私利代替社會公益成為社會粘合劑之時，「私利即公益」，唯利是圖理所當然地具備了神性。以利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邏輯自然地生成，資本邏輯全面地主導著整個西方社會的運作。

馬克思指出，這個資本時代到來了之後，所有人都被視為不可避免地是交換、交易，也許還有轉讓的對象。在這個時代之前，德性、愛情、觀點、科學、是非觀念等等，可以被轉讓，而不是交換；可以被贈與，而不是被出售；可以被占有，而不是被購買。在這個時代之後，簡單地說，所有東西最後都成為可以交易的了。因此，「這是一個普遍敗壞、徹底唯利是圖的時代，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在這個時代裏的任何事物，道德的或是物質的，都具有某種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價值，而適合它的價值則需要由市場來評定」。^[1]

西方社會面對疫情的無力狀態，正是拜資本邏輯所賜。毫無疑問，資本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範疇。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資本在追逐剩餘價值最大化的過程中，必然追求私有化、自由化與市場化。「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

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2]隨著資本的極度自由化、市場化進而導致資本的無限擴張，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資本所異化，資本家變成了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變成了待沽的人力資本。「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值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

政府的邏輯完全被資本的邏輯操縱了，有些時候卻無法按時提供公共物品，而且所謂的公共福利越來越形同虛設，並不能讓所有人均等地享受得到。至此，政府不過是代替資本在管理國家事務，而國家事務也不過是資本的載體與利潤的化身，儘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以來號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天堂。西方社會的運作堅持資本的邏輯，即尋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它要考慮的是成本一效益，投入必須要有產出，投資利潤率是其唯一目的。因此，如果無利可圖，人道主義就是一句空話，西方自由主義社會不會自發地陷入人道主義的窠臼之中。防護物資、檢測試劑、醫療衛生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只能依賴於政府，而政府卻受制於各路財閥的利潤考量而無計可施。正像馬克思指出的「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始終是：群眾貧窮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4]財富從來不會主動地向窮人傾斜，除非其中有利可圖。這就如同美國所深惡痛絕的槍支管理一樣，很多情況下政府只能是口惠而實不至，維護資本的邏輯就是政府的最大邏輯。

當人道邏輯讓位於資本邏輯，有病無錢就無法享受到應有的治療，那些優良器械只能閑置而不能物盡其用。美國的醫療技術與救治水平實屬一流，在美國只要有錢就可以實時得到預防性的病毒檢測，甚至私人公司都可以上門服務，然而這卻與普通人無關。無論是檢測、還是隔離、直至治療卻不是所有人能夠應付得起。

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癥結離不開「資本」的邏輯，「只有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並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繫本身的普遍占

有」。¹⁵¹早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批評亞當·斯密等人過分地迷戀與信奉資本邏輯，他們機械地認為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就在於財富的增值運動，認為掌握了資本邏輯就掌控了歷史的發展密鑰與抽象公式。這些學者堅信「資本是一切社會發展階段都普遍存在的生產工具和勞動材料，是一切社會生產都必須使用的，因而資本是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都存在的超歷史的永恆現象和範疇」，¹⁵²資本主義社會被無限擴張的資本所壟斷，最大的異化就是人被「資本」的全面異化，人只有在物質財富的占有中才能實現自我，成為只追逐利益的「單向度」的人，從而失掉真正的自我。現實的社會必須進行「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¹⁵³

正像伍德所指出的那樣，幻想依靠資本邏輯去維護資本主義的未來是無望的，「由於資本主義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範圍廣且影響程度深，其自身的矛盾毫無疑問將日益擺脫所有對其實施的控制手段。人們所抱有的實現一個人性的、真正民主的且生態上可持續的資本主義之希望，正在變得愈發不現實」。¹⁵⁴而且，資本邏輯並不會自發地實現財富的公平分配與社會的安定秩序，「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徵，或者市場經濟法則，能夠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並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是一種幻想」。¹⁵⁵

列寧早就這樣判定：「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著整個社會，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¹⁵⁶恰如鄭永年所指出的那樣：「在西方，近代以來一直都是資本主導政治的，而政治則是對資本邏輯的反應」。

資產階級通過手中的資本成功換取政治權力，然後再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獲取更加豐厚的財富，這是資本主義財富觀支配選舉制度的本質。

「國家的統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這種形式的地方，資本就用這種方式表現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種形式的地方，資本又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它的力量，但實質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手裏，不管權力有沒有資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

和國，反正都是一樣，而且共和國愈民主，資本主義的這種統治就愈厲害，愈無恥」。¹⁵⁷可以說，資本作為新財富觀是包括資本主義選舉制度在內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識形態，而且必將持續發酵。

二、片面的消極自由本位下放任的市場邏輯

為了使資本邏輯能夠暢行無阻，資本邏輯必須與市場邏輯配套才能作到相得益彰。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們時常看到一些西方自由政府極力倡導一種自願隔離、自行免疫、自我救治的情況，其中可以窺見放縱的市場邏輯身影。西方社會之所以不及時救援，甚至於一再延誤戰機，原因就在於它倡導一種根源於個人消極自由的放任的市場邏輯。市場邏輯只看重程序與過程，並不關注結果與實質；只看重自發秩序與自由規則，並不關注組織秩序與權威規則。

如果說市場的邏輯是資本邏輯的衍生物，那麼片面的消極自由就是二者共同的文化根源。「自由一宗」儘管有保守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派之分，個人自由卻是共同價值取向。「自由一體」儘管有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兩面之別，消極自由卻占據著支配地位，積極自由被忽略掉了。自由的消極一極被無限放大、片面地延展，伯林儘管承認兩種自由觀的存在，但同樣傾向於消極自由，他說：「有人認為我捍衛消極自由而反對積極自由，以為消極自由更文明，那只是因為我覺得，積極自由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更為重要，但與消極自由相比更頻繁地被歪曲和濫用」。¹⁵⁸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這裏所說的人的自由，是作為孤立的、封閉在自身的單子裏的那種人的自由」。「自由這項人權並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結合起來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人與人分離的基礎上。這項權利就是這種分離的權利，是狹隘的、封閉在自身的個人的權利」。¹⁵⁹這種自由既不能是也無法是與他人共享的自由，而只能是一種排他的消極自由。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如何擺脫枷鎖獲取絕對的自由成為西方自由主義探尋

的源源不竭的原動力。要獲得自由，就要擺脫身上的枷鎖，這些枷鎖在伯林看來有三種，「別人所加於我們身體上的干涉及限制、國家或法律對我們行動的限制、社會輿論對我們所構成的壓力」。^[14]真正的自由就是不被這三者干涉及限制，任何道德說教、社會公義、國家法律、人道情懷都不能阻撓人們的自由言行，就3月8日一天，西班牙舉行了850場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因為這是他們的自由，政府也束手無策，只能聽之任之。因為「不管以什麼樣的原則來劃定不受干涉的領地，無論它是自然法、自然權利或功利原則，還是絕對命令的要求、社會契約之規定或人們藉以澄清和衛護他們的信念的任何其他概念」，^[15]「對自由的捍衛就存在於這樣一種排除干涉的消極目標中」。^[16]我們不難看到，西方社會存在著的自由只能是不被干涉、「免於……的自由」。它強調自由的界限，越不被干涉就越自由。只要不被強制，我就是自由的；只要擺脫束縛，我就是自由的；只要能夠自決，我就是自由的。

人們消極自由的實現也就是自發的市場秩序的形成。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認為，自發秩序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最符合自由原則。自發秩序實質上就是市場秩序，自由原則實質上就是市場邏輯，即順其自然、聽天由命的規則，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規則，自由放任、適者生存的規則。比如意大利奉行集體免疫政策，其根據就是自然篩選、自我淘汰，最終幸存的就是應該幸存的。市場邏輯主導下的自發秩序，一方面呈現出自行抗疫、自行隔離、自願治療的情形，另一方面呈現出轟搶藥物、擠占資源的狀況。

自發的市場邏輯反對的恰恰是有特定目的的組織秩序與權威邏輯，自發秩序是被人「發現的天然秩序」，而組織秩序是被人「創造的人為秩序」。「發現」才是自由，「創造」是對自由的侵害。但是，如若只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規制秩序，為了效率而犧牲平等在所難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結果就是難逃馬太效應，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更有甚者要求老年人應該放棄治療，以免浪費公共資源，搶占青年人的公共機會，這種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時間盛行於世，為市場邏

輯作了最好的註腳。

自由主義者們堅信，通過理性自足的個人可以創造集體的理性，然而這只能是望洋興嘆的幻想，因為「除了參與私人經濟部門活動的人之外，公共活動的參與者也受制於此，都有使自己行為最大化的傾向，無行為主體的所謂的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市場邏輯內嵌的盲目性與滯後性的天然缺陷，注定其無法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暢行無阻。

市場邏輯具有明顯的盲目性。市場邏輯堅信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自然的秩序就是符合自然法的秩序，符合自然法的秩序就是合乎人的理性的秩序。但是，自然秩序就一定是理性的秩序嗎，這是存在問題的，市場邏輯實施自發調節，市場邏輯可能自動地變無序為有序，也有可能自動地變有序為無序。自由主義認為，人們可以預期個人會依據工具理性可以自覺達成集體理性。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卻是另外的景象。這次疫情最危機的時候，我們看到美國很多人會首先搶購槍支彈藥，然後就是食物醫藥，商鋪被搶、群體極化現象時有發生。那些精於功利算計的個人理性導致的是集體的非理性與社會的虛無化，萬能的理性導致「公共池塘悲劇」、「搭便車行為」、「囚徒困境」成為市場邏輯中的大概率事件，因為理性的個人都有一種「背叛」的衝動，每個人都想成為一隻「投機的智豬」。

市場邏輯具有明顯的滯後性，只有出現了問題才去解決。所以，我們發現很多西方政府似乎是在觀望、不作為，而實質上是市場邏輯在起作用。市場邏輯作用於個人，就表現為一定意義上的犬儒主義，不想作、不願作、不能作。因此，我們就不會驚訝瑞典為什麼會採取「四不」原則（即不檢測、不隔離、不收治、不公布）。人們的疑問在於瑞典落後嗎？不發達嗎？「沒有應急能力」嗎？瑞典是公認的非常富有和高度自由的國家，而且以其高度的福利享譽世界。「自由」的瑞典要靠公民的「自由」來抗疫，這是在考驗瑞典人的身體素質與心理素質呢，還是在檢驗人類的文明和理想國的道德底線呢。

市場邏輯在私人領域是行不通的。市場邏輯

就是自由交換的邏輯，交換既預設了平等和自由價值內蘊其中，也預設了個人欲望和利益需要的外在滿足，這既符合消極自由的條件，又符合個人理性的假定，似乎無可厚非。然而「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然而「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17]然而，所謂自由，只是出賣勞動力的自由；所謂平等，只是平等受剝削的平等；所謂所有權，就是一無所有；所謂邊沁，就是利益至上。而在這期間，老百姓並沒有任何自由、平等、所有權，而只有「邊沁」可言。

市場邏輯在公共領域是行不通的。實質上，隨著市場失靈的出現，政府在其中的功能與作用必不可少。在自由主義視界中，政治如同市場，民主政治的運行規則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則在政治中的運用。在這種政治市場中，「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試圖為自身贏得最大的好處，而代表們則趨向於被看作地方的或局部利益的純粹代言人，他們的功能就是在公共論壇中捍衛這種利益」。^[18]這不過是將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則延伸到政治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把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形容為民主的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把社會設想為市場（即市場社會）帶來的政治結果」。^[19]

市場邏輯就是放任邏輯，如果任憑個人自由行為，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多州會出現遊行示威了，不斷激增的失業人數、高企的個人債務、難以為繼的日常生活，會促使老百姓群起示威。加州與紐約州宣稱只會根據自身的判斷應對疫情和經濟開放。在紐約州的帶領下，美國東海岸7個州直接達成了「東部7州條約」，加州也成立了西海岸三州的「臨時同盟」，上演了「東西互保」的戲碼。

三、機械的理性主義本位下偏狹的選舉邏輯

自由思想的發軔離不開理性主義的濫觴、自由的泛濫離不開對理性的崇拜。當理性以世俗主宰成為新的上帝之時，世界就是被無情「祛魅」之時；當理性肆意侵蝕所有領域之時，人類就是被浸透「功利」之時。人們篤信理性萬能，無限膨脹的

理性廣泛殖民，試圖解決一切問題，當然更包括了那些不能解決的問題。

理性主義使得人們從神聖走向世俗，現代化就是理性化，理性化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功利化，功利化就是工具化。工具理性不適當地堂而皇之地侵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占據了本該屬於價值理性的領地，從此一切變得簡單與易操作起來，效率優先、功利算計、邊沁至上甚囂塵上，個人道德與社會公義遠離形上的思辨而變成世俗的運算與比較。功能優化、角色分工、社會定位將每個人都工具化成社會機器中的固定零件與自動齒輪，工具理性將人們變成徹頭徹尾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要擁有了手段與工具，人們便可一勞永逸地拋棄目的與意義本身。人們不再擁有生活的勇氣與超越，頹廢與虛無成為意義本身。

西方社會的發展就是工具理性逐步擴展，直到完全遮蔽與替代價值理性為止的過程。理性主義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枯竭耗盡所有的精神是其無法逃避的最終歸宿。工具理性的片面發展與無限伸張，最終導致世界將不再是充滿意義與價值的世界，「我們這個時代，因為他所獨有的理性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20]對工具理性的極端推崇，導致人們重程序輕結果，重形式輕實質，重效率輕公平。一種全新的工具性的「機械論」世界觀取代了傳統的「目的論世界觀」。被動的算計、消極的比較、無根的追求造就了個人的無助與孤獨。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次疫情面前，有些人就表現為一種無所適從、不知所終的窘境，無妄自殺、消極麻醉、集體逃避等現象就是明例。

西方社會的政治邏輯就是市場邏輯的衍生物，政治邏輯就是政治運作中的市場邏輯。理性主義裹挾市場邏輯，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一種如何獲勝的選舉理性，即勝選理性。美國疫情一直在蔓延甚至一度無法控制，然而特朗普卻在爭奪「復工權」，強制民眾復工，與其說是為了恢復經濟不妨說為了恢復選民的信任，儘管記者質疑特朗普

違背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即州政府有權處理該州公共衛生問題，而聯邦政府無權過問，但是迫於選票和行政壓力的特朗普政府仍然要唯經濟指標是舉。西方政治正當性儘管建基於人民同意說、人民委托說，但卻不是建基於民生的政治邏輯，而是建基於選舉的政治邏輯。優良的政治既包括合法性，也包括有效性。而真正的有效性就是使得選舉獲勝，政治的邏輯遵循的就是獲勝的選舉理性，即勝者為王、贏者通吃。有效的政治運作變成為贏得選舉而進行的一場場的政治「秀」。在這次疫情當中，一些人出於狹隘的政治本性會將新冠疫情說成是中國新冠，究其根本就是為選舉造勢，各國政客所竭力關注的就是選舉的勝面，因為在他們眼裏選票遠比疫情更加重要。

正如西方政治學中的「風標模型」理論所示，政府就是如同風標一樣顯現著選舉中的強風所向，難免不被壓力集團所「殖民化」。「經紀人模型」理論則昭示，國家並不是中立而自然地尊奉公共利益，無非就是選舉中獲勝的利益集團。政府所謂的政策，無非是為了獲取最大數量的選民支持而追尋統計學意義上的中數以下的選民的主觀偏好而已，誰代表了未來的票倉，誰就是政治施策未來所向。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治如同市場，公共產品也會像商品一樣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它要追求的是選票最大量。

以美國這次抗疫為例，之所以在防疫開端會隔岸觀火，貽誤最佳戰機，就是為了其政治需要。美國從1月21日就出現疫情，當時完全可控，但是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其目的就是為了不影響11月的總統大選，儘管出現了股市的三次熔断也在所不惜。美國反對黨在此期間也煽風點火，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犧牲公眾利益，肆意破壞防疫大局。選舉政治廣泛存在著黨同伐異的情況，相互傾軋導致了社會和文化的整合難以實現，反而不斷向分化和分裂演進。選舉政治以選票為基礎，政客為了上台，需要贏得地方選票，需要放大與迎合地方性、族群性利益，這無疑強化了利益分歧和族群對立。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期，美國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經濟最富裕的加利福尼亞州想要進行全民獨立公投

了。宗教政治、族群政治被極化，地方政治、局部政治被極化。為了選票，一切都被選舉政治化。政府本來應該是進行積極地防疫，變成了進行積極地拉票；本來應該是進行社會整合、資源整合，變成了推進社會分裂、利益分化。一個國家的執政者與在野黨會為了選勝，而主動弱化社會的統一和集中，積極強化對立與分裂。

在政黨眼裏，救災事小、選舉事大。疫情被政黨當作競選武器、勝出對手的工具，寧可錯失抗疫的最佳機會，也不能錯過任何一次打壓反對黨的完美機會。他們之所以要污名化、抹黑、栽贓、甩鍋，實質上都是要轉移矛盾，進行政治詭詐，輿論操弄，通過貶損別人以無形抬高自己的競選面。政黨林立、各自為政致使決策拖沓緩慢，調動醫療救護資源不力。當政治上的社會契約不能解決的疫情期間出現的各種問題時，人們只能求助於市場的自我調節來解決，當「社會的（不僅是經濟的）真正調節者不是（政治的）契約，而是（經濟的）市場」。美國社會最近上演的不是購買口罩，而是買槍自保、哄搶商品就是必然的結果。

選舉的邏輯依附於代議制民主制度，受制於獲勝的選舉理性，在本質上被資本的邏輯所支配。代議制民主制度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框架，作為其實現方式的西方選舉制度的形塑也同樣在於保護私有財產權利。代議制度的初步奠定為現代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證。其本質是：作為支配社會資源的「財富」在民主制度上的表達方式。因此，作為選舉制度核心的代議制度的形成同時也標志著西方選舉制度的形成。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西方選舉制度正式形塑，並成為西方民主社會的重要制度支柱，為資產階級追逐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文明的佐證。

由於對經濟基礎的絕對依賴性，必將使得西方選舉制度不能代表著所有人的利益，它只是表達資產階級意志與願望的工具而已。「凡是存在著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資本家用來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機器。至於普選權、立憲會議和議會，那不過是形式，不過是一種空頭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的實質」。^[21]

四、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本位下固化的冷戰邏輯

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中西方抗疫表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現象，一面是傲慢的西方「民主政體」出現了低效、無能、失策的消極狀況，一面是負責的「中國方案」出現了高效、全能、務實的積極狀況。這種反差衝擊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脆弱神經，他們不能看到中國處於世界的中心地位，他們不能看到曾經專屬西方的榮耀被中國占據，他們不能看到中國的影響力在日益增大。於是乎，西方中心主義者為削弱中國在抗擊疫情方面的突出成就和成功經驗，寧可抑制疫情的控制、延長患者的救治，甚至於降低公共產品的供給、遲緩經濟的復蘇，也要奮力地進行造謠、誹謗、陷害、甩鍋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傲慢與偏見來自於一種根深蒂固的自以為是的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

事實上，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在西方主導的「元地理學」視角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學思考框架，而變成了倫理學、政治學思考框架，其中彰顯的是西方中心主義觀念。當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一命題時，其弟子福山毫不遲疑地給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的答案，西方自由制度被標榜為「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歷史的終結」堂而皇之地為西方中心主義背書與助威。

西方國家一直以來憑藉其政治優勢與經濟優勢，構建其話語優勢與文化優勢，進行野蠻的文化殖民與文明霸權，造就了一股極端的種族主義優越論，以西方現代化標準衡量與規制世界，塑造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與倫理道德體系，從事實與價值兩個方面設計著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化。「依附論」「欠發展論」都是其寫照。在西方中心主義思維主導下，「自由」的人們奉行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認為非西方就是「非我族類」，是需要抗衡打壓的敵對方；非西方就是「欠發達」，是需要無私地成為西方的供應方；非西方就是「不文明」，是需要主宰和設計他們的發展道路。為了自己種族利益，甚至不惜以非西方之鄰為

己之壑。不難理解，當疫情在全球開始蔓延與持續高漲之時，歐洲各國不是堅持合作而是自掃門前雪，不是堅持共同應對而是哄搶醫用物資。更有甚者，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危機被當作地緣政治的工具，北約就趁俄羅斯無暇顧及之時進行軍演以搶占地區優勢，似乎維持地區霸權要勝過人類疫情災難。

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觀點，在政治上表現為認定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目前成長最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形態，並且強調其他國家必將在長期的發展中趨向這一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偏好與普適化的政治追求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將歐美政治制度塑造成為一種普適化模式，另一方面醜化與敵視其他國家。疫情期間，我們不難發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度驚現對亞裔面孔人士的歧視言行，這充分暴露了美國等政客試圖借此轉移民眾恐慌心理與不滿情緒，製造矛盾以提高已被拉低的政治影響力。

病毒沒有國界，環球同此涼熱。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世界性公共危機事件，需要世界各國共同面對。中國在抗擊疫情期間，以高昂的代價為世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經驗。然而，我們卻並沒有看到一些西方國家能夠在中國經驗基礎上再接再厲地取得抗疫勝利，反而是一系列「自由」操作，使得疫情愈演愈烈。疫情很可怕，但是比疫情更可怕的是背後的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我們看到，在全球疫情如此危機四伏的時候，北約卻還是想著去干擾世界秩序。為了維護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為了徹底壓制競爭對手，西方國家寧可強化西方種族中心主義，重拾冷戰思維。亨廷頓認為：「每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歷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與其他文明比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22]

冷戰邏輯特點之一在於「冷」，也就是只能是「冷」戰而不能是「熱」戰，只能是「暗」戰而不能是「明」戰，只能是文化戰而不能是軍事戰。冷戰邏輯特點之二在於「戰」，也就是只能「戰」不能「和」，只有「敵」沒有「友」。冷戰邏輯無疑就是零和博弈，贏者通吃。鬥爭雙方是敵我矛盾，這是



一場激烈的對抗性矛盾，冷戰思維就是非此即彼的對抗思維，只有矛盾鬥爭性而沒有矛盾同一性。同時冷戰邏輯裹挾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將非西方視為永恆的「他者」。摩根索曾預言，未來最可怕的帝國主義，既非軍事帝國主義，也非經濟帝國主義，而是文化帝國主義，是披著普世價值外衣的新國家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正是適應了冷戰思維特點，它具體表現為西方對東方實行的一種文化殖民。他們矚目且高揚自己的主體地位，蔑視且敵視非西方的從屬地位。

這種殖民話語體現了一種「自我」對「他者」的壓制與排斥。為了確證「自我」的主體地位，他們需要設計一個「他者」，以前是蘇聯，現在是中國。自我與他者的對立思維無論是在黑格爾還是在薩特那裏都表現為一種自我—他人的對立，他者設定自我的界限。西方中心主義者認為，無政府的世界狀態需要利維坦的強勢突起，以震懾那些犯上作亂者，美國等西方國家當仁不讓地充當世界警察，高傲地扮演著人類導師的角色。「中國威脅論」一直在西方的冷戰思維中存在。他們以「修昔底德陷阱」質疑中國的和平崛起，以麥金德「世界島」詬病中國的「一帶一路」，認為中國強則必霸，中國必然會強占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統治地位，因此妄圖將中國發展扼殺在搖籃中。疫情面前的中國表現再次讓世界震驚，中國的出色應對為世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難得的經驗。而冷戰思維主導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寧可貽誤戰勝病毒的良機，也要騰出時間和精力去抹黑與貶損中國，他們不願看到中國在這次抗疫過程中的成功表現，害怕失去其在世界的主導地位，所以寧可自己損失八百，也要傷敵一千。他們肆無忌憚地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將中國援助視為一場和平演變，將中國經驗污衊為侵犯人權，從口罩、防護服、醫療器械到醫務人員、管理者、政府部門一律進行無恥的污名化與妖魔化、極盡醜化與惡化之能事。政治偏見遮掩了客觀認知，意識形態替代了疫情危機，冷戰邏輯忽視了合作共贏。在此危急存亡之際，西方一些「自由」人士甚至開始討論模式優劣、制度優劣，以擾亂視聽，從中可見西方社會的冷戰思維的狹隘性與狂妄性，視生命如同兒戲的

殘忍性與恐怖性多麼登峰造極，多麼令人咋舌。

勒維納斯認為，他者意味著倫理責任，他者打破了自我的封閉性與狹隘性，自我對他者具有義務與責任。亨廷頓也提出：「文化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徵。在多文明的世界裏，建設性的道路是摒棄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23]

結語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曾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斷言，新自由主義已經在世界範圍獲得全勝，並且揚言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西方自由民主制，一時間「人權的終結論」、「歷史終結論」、「自由終結論」、「民主終結論」甚囂塵上，不絕於耳。然而，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卻無情地打破了這種狂妄的獨斷論迷夢。福山日前也在震驚之餘坦承「新自由主義已死」。^[24]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無疑遭遇到了嚴重危機，福山已無法再對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主義所特有的狹隘的意識形態、傲慢的價值觀念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與文化痼疾，嚴重地阻礙了其制度的歷史更新與現實運作，西方政治和社會體制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新時代的各種社會政治問題，資本主義制度「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25]了。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的文章中講的那樣：「重大傳染性疾病是全人類的敵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給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巨大威脅，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帶來巨大挑戰，形勢令人擔憂。當前，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鬥爭」。

項目來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西方普適正義話語批判研究」（項目號18AZZ008）

^[1][法]麥克爾·勒威：《馬克思和韋伯的資本主義批判》，載《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7

年第5期。

-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0頁。
- [3] 同上，第23卷，第260頁。
-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頁。
- [5] 同上，第8卷，第90頁。
- [6] 高雲涌：《資本邏輯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三重內涵》[J](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3)，第28—33頁。
- [7] 同註[5]，第186頁。
- [8] [加]埃倫·伍德，夏璐譯：《資本主義的起源——一個更長遠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頁。
- [9] [法]托馬斯·皮凱蒂，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頁。
- [10] 列寧·列寧選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 [11] 同上，第37頁。
- [12] 拉明·賈漢貝格魯，楊禎欽譯：《伯林談話錄》[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 [13] 同註[2]，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頁。
- [14] 石元康：《當代自由主義理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9-20頁。
- [15] [英]以賽亞·伯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
- [16] [英]同上，第196頁。
-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 [18] [法]讓·施皮茲：《共和國的黃昏？》，載應奇、劉訓練編：《共和的黃昏：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413頁。
- [19] [法]皮埃爾·羅桑瓦隆，楊祖功、曉賓、楊齊譯：《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頁。

- [20] [德]馬克斯·韋伯，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8頁。
- [21] 列寧·列寧選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 [22] [美]塞繆爾·亨廷頓，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頁。
- [23] [美]塞繆爾·亨廷頓，李盛平等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頁。
- [24] 《文化縱橫》2020年4月。
- [25] 同註[17]，第199頁。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ern Liberalism Culture under the Covid-19

Wen Changchun (Government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ay how the western society responds to Covid-19 is imperfect. During the outbreak,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even the government are helpless, and the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To trace, the root cause lies on the western culture of liberalism, the social mainstream paradigm, which is much to be blamed. The outbreak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liberalism cultur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ory, they are in compliance of absolute individualism, superficial yet pessimistic freedom, mechanical rationalism and intrinsic western centrism. In practice, they have evolved into the logics of monopolistic capital, laissez-faire market, prejudiced election system and solidified cold war. Liberalism, constrained by the above limit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evitably, falls into predicament. The western society, when riding out the “epidemic”, exposes the crisis inherent in their liberalism culture much further, and its innate pride and prejudice reveal the weakness of the liberalism culture

Keywords: Covid-19, Cultural Crisis of Liberalism, Individualism, Western-centrism